

中华文化园地

把“贵州”置于文化的视野中加以评说和研究时,“文化的”贵州就不可避免地要“溢出”贵州现实的行政边界。这种“意义溢出”,正是被这一地域特定的文化生态“先天”地决定了。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开始,经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到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设置贵州按察使司,最终使贵州成为当时全国两直隶和十三个布政使司(俗称省)之一,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贵州建省”。倘若以自“建省”至今的五百多年来研究贵州文化,显然很不够,还必须上溯到未有“贵州”之前的若干朝代中这一地域的种种文化现象——因此,文化的“贵州”,既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其意义在历史中不断衍变的文化概念。

至于“文化”,定义已有若干,概括起来大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了物质、制度和观念(或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等层次和形态,综合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狭义的文化,则是指人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性的观念形态的成果,它记录了人类世代代累积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内容,使人类文明的成果得以传承,因而这种狭义的文化即是观念形态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里只涉及狭义的文化。这种文化,与经济、政治等观念并列,它与经济、政治共同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三个部分。

因此,在我看来,把上述意义的“贵州”与“文化”联结在一起时,也就意味着是在指认“贵州的文化”或“文化的贵州”——它记录了贵州人世世代代累积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内容,使贵州文明的成果得以传承。贵州文化既有地域的特色,也有空间的限制,我们可以用空间或时间来给文化命名,比如“贵州古代文化”与“贵州当代文化”,“贵州文化”与“巴蜀文化”或“中原文化”,如此等等。但是,这类命名其实并不能真正反映出贵州文化的本质。比如说,当我们在言及“贵州文化”时,就空间而言主要是指贵州这一特定地域的文化,就时间而言应包括古代的、近现代的(清朝后期、军阀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当代的贵州的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则主要是指封建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就人群而言则又有贵州汉族的文化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因此,就贵州文化的整体而言,必须充分认识到它的组成的复杂性。因此,只有当我们把“贵州文化”视为一个不断运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时,只有当我们如荷兰学者冯·皮尔森所言,不再把“贵州文化”视为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不仅是传统,而且是任务时,我们才有可能通过对文化的历时性动态进程和共时性多样化形态的研究,以期真正把握“贵州文化”的真谛。

任何生命的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有生命的贵州文化在演化、运动过程中,离不开孕育、滋养了它的生态环境,即贵州的自然—社会条件,其中也包含着历代贵州各民族在不断适应和改造所处自然—社会环境中创造贵州文化的历程。在这里,“自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环境,“社会”则是人们无法舍弃的人造环境。人,在这两种交织的环境中进行着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同时也在这一环境中被改造和创造着——这,就是作为以“文化”为特征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生态—文化生态。

因此,在我的认识中,关注并企图言说“贵州文化”时,无论如何也必须以历代贵州各民族生活的“贵州”特定自然环境基础为出发点,进而去探讨他们在此基础上创造并发展起来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种种变更——这就是他们赖以生存并得以创造“贵州文化”的生态环境。倘若缺少甚至忽视了对贵州文化生态环境的探讨,我们将无法渐次逼近对贵州文化的真知。

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文化的生态环境”。一方面,在各各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孕育了各各不同的文化类型;另一方面,在同一地域中,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和文化自身的运动规律,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形成不同的

文化形态——由此,而充分显现出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其实,这种认识,早已存在于先秦的典籍中,《礼记·王制》中就有“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文字;十九世纪末西方的丹纳、勃兰克斯等,也有关于种族、环境、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三要素的论述。这也正如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要认识“国情”、“省情”的话题。这“情”,所指实则就是我们所处的、由地理、历史、人口、经济、政治、生产方式、传统心态等因素构成的自然——社会环境。

如果说,古代的贵州各民族,在进入文明之后,西方殖民者侵入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主要是在“华夷之辨”中、在与周边的巴蜀文化、楚文化、滇文化等的文化生态差异中、以及因这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与整合中,逐渐把握“本土”与周边的各自文化特质的话,那么,近代以后、特别是当代的贵州人,在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参照系之后,则是通过对比中国的农业文明与西方的工业文明,从这两种文化生态的差异中,对中国及贵州自己的文化特质加以重新认识——东方与西方、贵州与国内其他地域的文化差异何在?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何在?中华民族、贵州各民族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文化焕发新的生命活力,并迎头赶上?我们自己如何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层

贵州文化生态：学与问

何光渝

面,逐渐深入地把握这种种差异,进而探究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思考其中各自的生成机制?……如此等等。在我看来,要面对这些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把目光深入到“文化生态”的领域。

首先,是对于贵州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研究。毫无疑问,自然地理环境作为生态的基础,也是文化创造的重要物质基础。当然,在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上,我不是主张“地理环境决定论”,对文化的成因必须作自然—人文因素的综合研究;但是,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不可能离开人类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所处的特定自然条件,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列宁早就指出:“地理环境的特征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也因此,千差万别的自然地理环境通过物质生产这一中介,再加上不可忽视的人文因素(人的选择能力)的介入,对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施加着重大影响。于是,便形成了不同地域中各个不同的社会生活格局、民风民俗和情趣各异的文化结晶。我以为,正视贵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于贵州文化的巨大影响,贵州的周边地理环境对于贵州文化的影响,对于贵州文化传播(文化传出与接受的双向交流)的影响,以及历代、特别是近代以来贵州人为打破封闭隔绝状态所做的各种努力及其结果;考察地理环境为贵州的创造和发展文化所提供了怎样的可能性,以及我们贵州人如何在这些可能性中作出现实性的选择,进而创造出真正堪称为“贵州文化”的文化类型——这才是我们贵州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是对于贵州文化的经济环境的研究。人是自然的产物并始终为自然所影响和制约;人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塑造和发展着自身。人与自然的这种双向同构关系,是我们考察文化经济环境的逻辑起点。在贵州的“这一个”自然条件和地理背景下,贵州历代、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各民族人民,如何发展,以及发展了什么样的物质生产方式,为贵州文化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经济环境,显然十分重要。贵州的物质生产方式,历来、特别是在古代,在整体上明显落后于中原、三秦、荆楚、吴越、巴蜀等许多地域,从渔猎向农耕的过渡、农业的发生期相对滞缓。那么,在这一地域中生活、生产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在不断的迁徙、聚合、互市、争战、和亲中,使不同的经济类型不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不断互补互摄,发生了从“采食经济”到“农耕经济”,从“穴居而野处”到定居务农,从氏族社会渐次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程,最终使得农耕经济占据优势,可以通

过直接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来获取生活资料,成为贵州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对这一进程及其对贵州文化自古至今的延绵贵州作用所能够研究的继续,受到重视和重视的程度,从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虽然也曾出现过一些变化,但是,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宗法制度(包括其各种变种和遗存),始终保留着。这是不争的事实。自西周的古典形态的宗法制度解体后,其遗存仍深藏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之中,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定势。对这四种权力,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早有精辟论述。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组织系统,对中华文化的外在形态和内在品质,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作为多民族的贵州,虽然建省仅五百多年,在各民族的意识中,“四权”观念的强弱亦有差异,但其社会组织系统在整体上也是概莫能外的。对于这样状况下的社会组织环境进行分析研究,是可以探究到贵州文化发展和生存机制的核心问题的。这种社会结构的宗法特征和专制特征,作用于文化,形成了“伦理——政治型”文化,不仅长久地支配着社会风俗、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血亲、孝亲、道统、心法等),而且对意识形态影响极深,表现为十分突出的恒久不变的“思想大一统”,政治理论的早熟和发达,文化活动有着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成就文化必须寻求某种“权”的荫庇,文化人的“学”与“仕”的追求互为表里……等等。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成为中华文化观念的核心,其积极意义和消

极意义共存。这种观念,在贵州这一特定地域中,对贵州文化有何影响,如何影响;这种影响和作用,与其他地域相比较有何差异,它们在今天的贵州,还具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探究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也是极有借鉴意义的。

我们的贵州文化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根基,就深扎于贵州这片土地上。这片土地为它提供了天然的和人造的生态环境,为它从远古直至今日的一切荣枯兴衰提供了背景和条件。因此,在我看来,的确有一个正常看待贵州文化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那种认为贵州文化“丰厚优越”、“得天独厚”的宣传和说法,至多是一厢情愿的说说而已。贵州文化,由于其特定的生态环境,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同样是精华与糟粕相纠结,在一些方面,较之其他地域会有程度迥异的优劣之处。客观地看,文化确有强势与弱势之分。在与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和碰撞中,强势文化必然影响弱势文化,后者必然要受到前者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水之趋下,不可逆转,

被任继愈先生称为“文化势差”。贵州文化的一个方面是传统,但另一方面,这个传统又是包含在贵州人的主观能动的活动变化之中,是包含在现存文化形式所体现的无数变化和发展的可能性之中。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今天要创建贵州的新文化,离不开贵州已有的文化,同样也离不开贵州已有的文化生态环境。而我们已有的文化和已有的文化生态环境,都有着十分复杂的性质和内容。如何对待它们,关键是应当抱有充分的理性精神,否则会为一些非理性的思潮所支配。且不说在民间出现的种种伪文化、伪古迹,仅就学术界而言,一方面,基于实用的立场,对以传统文化来解决当前

进行揭露,并积极郑重地处理

面临的各种问题,抱着不切实际的期盼,结果是把过重的任务加到传统文化之上,造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牵强附会、轻率而不严肃的学风。另一方面,又以浪漫的心态,把贵州历史的严峻真相真情,湮没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之中,或把传统文化视为具有永恒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力量;或把贵州文化的积淀,不加分析地与其他省区等量齐观。历史早已证明,一种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如果失去了吸纳和融合其他文化的能力,就不可能得到壮大和发展。同样,一种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如果不能够以自信的目光,对自身进行挑剔和批判,以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如果不能以宽容、开放和虚心的心态,去评价和学习其他地域的文化,并吸取对自己有用的文化成果,那么,无论其自我感觉有多好、“本土”调门有多高,对于历史和现实,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历代贵州经济的不发达,严重滞碍了贵州文化的发展。贵州经济落后的原因众多,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显然是文化观念的落后,而这正是封闭心态的局限,是对农耕文化惰性因素的承袭。不论从现实的或历史的角度来看,贵州都是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差异、又有交融、互相促进的一个多元体系。历史上,贵州的文化,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但由于它对于周边地域文化长期不断的吸收,从而又具有开放性的一面。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开放性对于贵州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曾经产生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向西部的倾斜,贵州作为西南交通的枢纽,还将成为多维文化进入、交流、融合的结合点。这实际上是由贵州天然、“命定”的区位所注定了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文化未来的发展,如果没有一种对于文化生态的正确认识,并由此而进一步思考如何促使它向着良性的方向变化,那么,贵州的文化建设的基础将是十分脆弱的。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环境和宗法—专制社会组织环境已经基本退隐,贵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在一些方面也已发生了显著变化。贵州文化的生态环境在变化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与传统的农业文明和传统的精神文明无法完全契合,传统的观念和思维框架,已经和正在被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所突破。中华文化进入了一个艰难曲折的综合创新转型过程。这对于整体上处于弱势的贵州文化尤为艰难和痛苦。

如何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创造有利于贵州现代化建设的、有利于贵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生态?这是文化研究者应该正视并回答的课题。但仅有他们的关心,显然是很不够的。

(刊头题字 邓健)

学习与思考 △第535期△



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我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下,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靠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靠艰苦创业”。其六,是我们的历史教训决定的。邓小平同志多次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